



资料下载

- 马克思主义论坛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改革与发展
- 经济研究
- 海派经济学季刊

站内搜索

搜索

当前位置: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资料下载 > 海派经济学

## 高鸿业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方福前（海派经济学季刊第18辑）

发布时间：2010-05-30

2007年5月17日，我国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高鸿业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大师级学者。

高鸿业先生于1956年初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以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1998年改为经济学院）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一生致力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经济学这块园地里勤奋耕耘，硕果累累，贡献卓著。

### 一、高鸿业的学术贡献

高鸿业先生首先是一位教师。作为一名教师，他的贡献除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以外，还对在我国普及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和创建适合我国需要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 （一）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自1948年初版以来就以其理论的综合性、体系的完整性、表述的规范性和内容的更新快而风靡西方世界，一直畅销不衰；它既是一本继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初版）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初版）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三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又是一本代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首次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的就是高鸿业教授。

翻译一本书（即便是一本畅销书）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这本书翻译出版的背景和意义与众不同。

长达10年的“文革”使我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也造成我国经济学界万马齐喑。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学界如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刻。当时我国的经济学人，除了政治经济学以外，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什么叫“资源配置”、“需求弹性”、“GNP”和“IS-LM模型”，在校大学生也没有其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可读。80年代初美国货币主义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首次来华访问，他在学术报告中所说的“自然失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不但下面的大多数听众不知所云，甚至连我们的翻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一个民族长期闭关锁国，如同一个人长期离群索居，当我们打开国门与他人交往时，恍若一个19世纪的人与20世纪的人对话，彼此之间缺少共同的语言，尤其缺少共同的经济学语言。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高鸿业先生翻译的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的次年（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既适合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又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教学注入新的内容。正如高鸿业先生在为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序中所说：“除了本书作为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而在个别的概念、论点和方法上具有现实意义以外，本书仍不失为一本有用的参考著作，它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应该掌握的资料和知识。”<sup>①</sup>虽然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中含有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其中的有些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但是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却大大促进了现代经济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加快了我国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扩展。我们这一代中青年经济学者，大多是从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的殿堂的。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认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高鸿业先生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意义绝不亚于近代严复先生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的书名为《原富》）的意义。国人今后撰写20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应当浓墨重彩地写上高鸿业先生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 1. 著《评萨缪尔森〈经济学〉》

萨缪尔森《经济学》在我国翻译出版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人的现代经济学水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这本书毕竟是一位西方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范式并根据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写成的，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思想倾向和他所在社会的局限性。尤其是，这本书所说的内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到的或体会到的现象和关系，而这些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没有说或说得很少的；并且，这本书大量使用几何图形和数学形式来表述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形式化语言也是政治经济学很少使用的。因此，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读了这本书以后既感到新奇，又觉得解渴、有用。于是有些人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起来。

帮助国人正确地认识西方经济学，不但是青年学生的需要，也是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要求。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为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指明方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一些老教授的建议下，高鸿业先生自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连续发表10篇评论西方经济学的系列文章。这10篇文章对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论。这10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撰写的最为系统、最有深度的评论西方经济学的系列论文，它对正面引导我国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高度赞誉。1987年这10篇论文以其高质量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8年，高鸿业先生将上述10篇论文加上他为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和第12版中译本所写的两篇序言集结成书，取书名为《评萨缪尔森〈经济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许多内容和观点就是在今天来看也具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少数高校就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不过，那时把这门课程叫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这种经济学说。“文革”期间，这门课程因为姓“资”而被取消（也无人敢开设）。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在全国率先恢复开设了这门课程，并把这门课程更名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讲这门课程的主要有高鸿业、李宗正和吴易风等教授。这门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每堂课都座无虚席，甚至教室过道和走廊上都站满了听课的人。当时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也推荐他的博士生来中国人民大学听高鸿业等人讲课。

在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开设了西方经济学一课。但是，开课首先必须有教材。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在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多年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高鸿业先生和他的同事吴易风教授联合撰写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1990年，这本教材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西方经济学教材，但是却是质量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这本教科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1年夏天，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当他们翻阅完这本教材时（其中一人懂中文），他们为中国学者能够撰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教材感到十分惊奇。

20世纪90年代初，高鸿业先生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主持西方经济学这门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工作。1996年，他主编的核心课程教材《西方经济学》第1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从第2版（2001年8月）开始，这本教科书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笔者所知，目前由我国学者编写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几十种之多，其中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使用量最大，知名度最高。这本教科书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该书第2版于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该书的第2版、第3版和第4版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九五”、“十五”和“十一五”规划教材。90年代以来进入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学习的学生，没有读过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可能为数不多。

## 2. 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提上了改革的议事日程。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所有制关系如何进行改革，按照什么思路、什么取向进行改革，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和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因而，国有企业和所有制改革是1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不同的改革思路成了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高鸿业先生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以严谨的学风、务实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这场改革的研究和讨论，并对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理论界有关重大问题的争论坦陈了自己的观点。高鸿业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和吴易风、杨德明两位教授合著的、由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书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一书几乎涉及到90年代以来有关我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该书共分5个部分，它们分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产权问题，宏观调控，外资政策和对外方有关经济理论分析。该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一份重要的理论成果。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谈到这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

## 3. 重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著作，该书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其有效需求原理和政府干预论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是经济学的哪个流派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总是要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提到凯恩斯及其《通论》。即便进入了21世纪，《通论》还在西方国家重印发行。这说明，《通论》虽然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但是在今天，它仍然是经济学家们研读得最多的名著之一。笔者认为，没有读过凯恩斯《通论》的人，不能说是真正研究了宏观经济学，至少不能说是研究了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创立过程。

我国在1957年曾经由三联书店出版过《通论》的中译本，从196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过这个中译本。这个中译本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汉译世界经济学名著之一。但是，这个中译本是用白话文夹杂着文言文来表述的，这就增加了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阅读这本书的困难。加上凯恩斯当时是以上的同行经济学家写这本书的，使得这本书的内容比较艰深，有些地方相当晦涩难懂。内容深奥加上汉译文不好读，使不少读者对《通论》望而却步。因此，重新翻译凯恩斯《通论》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多年的呼声。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高鸿业先生就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重新翻译凯恩斯《通论》。早在70年代，高鸿业先生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就以其译文的信、达、雅而受到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高度评价。1998年，高鸿业先生重译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更好地理解凯恩斯的思想，高鸿业先生在翻译《通论》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通论》中的难点、表述不当之处以及相关的背景知识作了详细的评注。据笔者粗略统计，高鸿业先生为《通论》重译本所加的评注共计在5万字以上。这些评注是高鸿业先生多年研究《通论》的心得和成果，它们将为一代又一代学子读懂《通论》提供锁钥。

## 二. 高鸿业的主要经济思想

高鸿业先生作为一位学者、一位经济学家，其经济思想涉猎的范围较广。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择其主要思想概述如下。这些经济思想也是高鸿业先生学术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对西方经济学要进行分析，既要吸收、借鉴有益的成果，也要排除、摆脱不良的干扰和影响”

高鸿业先生对西方经济学的总体态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系统地了解，详尽地研究，有分析地吸收。他认为，首先要对西方经济学有系统的了解，这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吸收的前提与基础。并提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式是读西方经济学原著，不用或少用二手材料，只有通过系统地读原著，才能掌握西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原意。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来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以辨良莠；二是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假设前提与适用条件。只有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分析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用的观点、概念和方法，为我所用。高鸿业先生认为，西方经济理论大多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在彼时彼地有用的理论或政策，在此时此地未必有用。他极力反对不顾前提条件，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高鸿业先生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持慎重、认真的态度，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不要匆忙下结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评价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应该持慎重的态度。在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未加深和彻底理解以前，至少不要对它轻率地做出结论。因为，评价西方经济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sup>[2]</sup>这种求真的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高鸿业先生一贯认为，“对西方经济学要进行分析，既要吸收、借鉴有益的成果，也要排除、摆脱不良的干扰和影响”。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说明，所以也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借鉴之处，只是在借鉴时要注意到我国国情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因此，高鸿业先生一方面大声疾呼“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为我改革所用”，“对西方经济学必须讲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有不少合理内核可借鉴”，“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可以借鉴和吸收”。<sup>[3]</sup>

### 2. “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评价应当建立在三个层次区分的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生活在19世纪，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做出直接评价。与

以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许多新内容、新形式和新特点，因而我们不能拘泥于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某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和观点的评价，来对现代某个西方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和观点进行评价。因此，如何正确地评价现代西方经济学，以便吸收其对我有用的东西，避免其对我产生有害的影响，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所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高鸿业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应当建立在三个层次区分的基础上：一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理论，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纯技术的内容加以区分；二是把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体系与其中的某些观点、概念和方法加以区分；三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加以区分。我们认为，高鸿业先生的这个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得出的一个创新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高鸿业的上述思想不是近几年才形成的，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现代西方经济学刚刚引入我国，高鸿业就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查阅一下高鸿业先生为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中译本所写的序言。

### 3. “数学方法能否产生有用的成果取决于应用数学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特点之一是数学在其中应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这样就给人尤其是给初学者造成一种印象：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的结论具有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证明的性质。

高鸿业认为，对于经济理论，数学方法是一种分析、论证和研究的工具，这种工具能否产生有用的成果，取决于应用数学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数学方法可以为正确的理论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理论效劳。同一种数学方法既可以用于论证真理，也可以用于支持谬误。从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推理过程都具有严谨的和合乎逻辑的数学形式，然而在事实上，同一数学形式的推理过程却可以导致正确的结论，也可以导致错误的结论。当数学方法为正确的理论进行论证时，它可以对经济研究做出贡献；当它为错误的理论进行辩护时，它也可以用它所特有的逻辑形式为错误的结论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单凭是否使用了数学方法来判断经济研究成果的正确性，要看数学方法的应用是否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数学方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否则，便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因此，高鸿业认为，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在一些重大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家虽然运用了正确的数学方法，但却得不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正确的数学形式改变不了错误的经济学内容。高鸿业先生举的一个例子是，西方经济学家试图用欧拉定理来论证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在这里错误的不是数学上的欧拉定理，而是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不能使用数学？数学在经济研究中有多大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高鸿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

高鸿业认为，经济现象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所说的“复杂”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经济现象的变化所牵涉到的庞大数量的变量、因素和条件，它们的数量往往庞大到数以百万计的水平。更为重要的第二个意义是：经济现象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的表象又处于变幻莫测和迷离混沌的状态。

对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作为分析工具的数学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已经取得有用的成果。但是，以解决上述那些复杂的经济现象的问题而论，目前数学的技能还难以奏效。尽管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变量、因素和条件，数学方法还是无能为力。

数学方法不但难于处理数量异常庞大的数据和变量，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在上述变幻莫测和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其中仅有一部分才能被认为是随机变量，从而可以用数理统计的法则加以处理。然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非随机的方面，特别是对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状态的分析，数学方法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高鸿业指出，以今天的水平而论，数学方法仅能解决规模相对微小和关系相对稳定的经济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数学方法仅适合于被应用在规模有限和关系不变的经济管理的具体问题，而在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西方经济理论上，由于数学方法在目前很难被应用到这一领域，所以它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基于上述分析，高鸿业的结论是：“数学被应用于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并不在于数学方法本身，而在于西方学者在许多场合把数学方法和使用数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恰当地运用到经济理论上来；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么，它一方面可以造成西方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的假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不到西方学者使用的数学方法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仍然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不论就哪一方面而言，这都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也不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sup>[4]</sup>

### 4. “不能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被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这是一场改革攻坚战。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既无成功的先例可引，也无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可用。于是，用什么理论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成为当时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主张用科斯定理作为这场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理由是，科斯定理研究了产权明晰、产权交易和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

在科斯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高鸿业先生在1991年第3期《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科斯定理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一文，明确提出：“不能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不能把科斯定理作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呢？高鸿业先生的理由是，科斯定理的主要作用在于以产权明确化为手段进一步夸大私有制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即便在西方，科斯定理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怀疑与责难，至少可以说，有关该定理的正确性和应用价值的问题仍处在争论之中；并且，科斯定理所涉及的内容也与我国所有制改革无关。因为，首先，“我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从而决不可能完全否定公有制企业的存在，而在科斯定理中，根本没有公有制存在的余地”。<sup>[5]</sup>其次，我国所有制改革中提到的效率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而科斯定理所说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用成本最低的资源配置方法来生产消费者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效率与劳动者（或其他当事人）的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积极性无关。“由于科斯定理不适合我国的这一国情，因而它亦不能在我国所有制讨论中加以应用。如果强行应用，那就会构成驴头马嘴的情况，与现实无补，甚至有害。”

<sup>[6]</sup>高鸿业先生进一步指出，除了其他方面的错误以外，科斯定理忽视了收入分配的效应。“如果根据该定理的指导而贸然进行所有制改革，该定理所忽视的收入分配效应可以造成生产力的下降甚至社会动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sup>[7]</sup>高鸿业先生在十几年前发出的这个忠告在今天读来也是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

### 5.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构造竞争环境、提高竞争程度”

主张把国有企业统统私有化的人一般有这样一些理由：（1）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率不高的关键在于缺乏利己动机。（2）私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3）国有企业搞不活的关键在于行政干预束缚。高鸿业先生在《私有化与提高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文中指出，这些私有化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从而是错误的。

高鸿业先生认为，上述第一点理由就小规模的经营而论是无可厚非的。确实，在类似夫妻店和家庭农场那样的小经济单位中，私有利己的动机提高效率的功能非常明显。但是对大中型企业而言，股东选出董事、董事任命经理、经理遵照股东意愿行事的说法不过是法律上的简单逻辑推理，基本上不符合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现代大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其专业化的生产和管理的知识使得仅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很难对经理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决策、行政和运转。股东们只能通过代理人来执行他们的选举权，而大多数股东的代理人即是公司的现任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专业知识和熟知公司内情的经理们不但垄断了公司的管理权，而且还能对公司的所有权加以控制。因此可以看到，在小规模经营中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私有动机在大中型企业很难、甚至不大可

能被发挥出来，从而与这些企业的效率没有多少关系。

关于私有化的第二点理由，高鸿业先生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其明晰程度决不亚于私有企业。在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私有制下的经理会比国有制的经理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率。私有制可以使产权明晰化的看法，仅仅适用于过去的小规模经营占主导地位的私有经济社会。到了今天社会化的时代，私有制下的产权不但不再明晰化，反而越来越模糊化。因为，一方面，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使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这使得企业的内部组织越来越复杂，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的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西方金融企业（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银行信托部门和互惠投资基金）的扩大和发展使得由这些企业代理的最终投资人既不关心也不知道他们股票的股权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企业。

关于私有化的第三点理由，高鸿业先生认为需要加以分析。有些行政干预有积极作用，例如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有些行政干预是出于政策性的和全局利益的考虑，例如美国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有些行政干预确实会影响企业的效率。

那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何在呢？如何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率呢？高鸿业先生认为：“决定企业效率高低的关键之点为：是否存在一个有利于企业竞争的环境。因此，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不在于从微观的层次上改变所有制，即把公有改为私有；而在于从宏观的层次上向这些企业提供有利于竞争的环境。”<sup>[8]</sup>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看，如果缺乏有利于竞争的环境，私有企业的效率也不会提高。相反，如果存在着有利于竞争的环境，国有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高鸿业先生自1946年到1957年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了12年，他对私有制、股份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有系统了解和深刻认识的，他的上述看法绝不是走马观花得出的印象。

#### 6. “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

高鸿业先生不赞成把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向定位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他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并不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

为什么私有制市场经济不能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呢？高鸿业先生认为，西方微观经济学说私有制市场经济可以用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既与事实不符，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和缺陷：第一，严峻的假设条件，例如假设存在完全竞争。第二，价格不是调节供求的唯一因素。第三，对控制市场力量的忽视。第四，对收入分配的忽略。第五，所论证的效率的局限性。第六，私有制市场经济对生产施加的限制条件。<sup>[9]</sup>

高鸿业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除了我国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以外，下列原因使得我们考虑经济问题和发展经济时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1）我国的市场机制刚刚建立，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而，在西方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在我国当前不一定有效。（2）我国有沉重的人口负担，我们制定经济战略和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以此为出发点。（3）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基本建设。因此，和西方经济以私人物品为主不同，我国经济中公共物品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 7. “经济政策必须配套，具有弹性和稳定性”

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宏观经济管理方法的改革。由于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加上旧体制不可能一夜之间退出经济生活，因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放”和“管”之间几上几下，在制定政策上朝令夕改的事时有发生，由此引起经济生活的震荡。针对这个问题，高鸿业认为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政策必须成龙配套。一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不能单凭这项政策本身的作用加以判别，还要看与其相配套的其他政策是否与之相配合。例如，利改税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加强税收管理的政策与之相配合，就会发生偷税漏税现象，从而使利改税政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经济政策必须具有弹性和灵活性，尽量避免“一刀切”。因为经济事物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性质相同的企业也是如此。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如果不顾客观经济条件而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虽然这种政策执行起来较为简单，但是执行的结果就可能是：一些地区、部门或企业“切”在“脚趾”上，而另一些地区、部门或企业则就“切”在“脖子”上，或者是“拦腰一刀”。例如，在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中，一些企业可以比另一些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如果国家要想压缩投资，就应该较多地压缩效率低的企业投资，而不能压缩甚至还要增加效率高的企业的投资。如果实行“一刀切”的压缩投资的政策，必然会切掉了效率高的企业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第三，经济政策必须避免大起大落。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上的经济活动都不是在瞬间所能完成的。因此，经济变量之间的调整需要时间。如果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地改变某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会使经济生活处于混乱和停顿的状态，从而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高鸿业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主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配套改革和渐进式发展的道路，实行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这种看法后来实际上被我国经济学界多数人接受，也被政府所采纳。例如，1985年4月，高鸿业应邀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作“关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报告，在谈到如何借鉴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时，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上述观点。这个讲话稿后来印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委员会，以供决策参考。

#### 8. “中国经济学要着重从经济管理和运行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鸿业先生提出，“中国经济学必须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要“着重从经济管理和运行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sup>[10]</sup>为什么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时，必须着重从管理和操作（运行）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呢？高鸿业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例如，它固然可以使信息传播迅速，供求反应灵敏，但是，它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国家必须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适当的限制和管理，而要想实行适当的限制和管理又必须充分了解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具体操作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势必引起至少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管理的问题，以及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具体操作问题”。<sup>[11]</sup>我们认为，高鸿业先生的这个见解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指明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M]. 第10版, 高鸿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1981.
- [2] 高鸿业. 评萨缪尔森《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3] 高鸿业、吴易风. 现代西方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 [4] 高鸿业主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 [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重译本, 高鸿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6]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 [7] 高鸿业、吴易风主编. 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 第2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8] 高鸿业、吴易风主编. 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 第1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 [9]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M]. 第4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收稿日期：2007—3—13

作者简介：方福前（195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316.

[2]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511.

[3]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227—234.

[4] 高鸿业. 评萨缪尔森（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34—135.

[5]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423.

[6]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424.

[7]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426.

[8] 高鸿业、吴易风、杨德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1.

[9]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124—143.

[10]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455.

[11] 高鸿业. 高鸿业选集[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468.



[关于我们](#)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财大首页](#)

版权所有：上海财经大学 地址：上海市国定路777号 邮编：200433 技术支持：上海时光基业软件有限公司